

從流俗詞源論詞語內部形式的湮滅與重構

王松木*

〔摘 要〕

在語言學家尚未以科學方法追溯詞源之前，一般民眾已大肆發揮聯想力與創造力，依照自己認為合理的方式，將陌生難解而不知所以然的詞語加以同化、類推，改換成自己熟悉的、發音近似的、或意義相關的詞，以此種主觀比附、想當然爾的方式所推求出來的詞源大多數是不可靠的、禁不起驗證，德國語言學家佛爾斯特曼（Förstemann）稱之為 Volksetymologie（英譯為 folk etymology），即所謂的「流俗詞源」、「俚俗詞源」或「民間詞源」。

本文以流俗詞源作為主要觀察對象，一方面著眼於語言符號內部因素，參照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的自組織過程（self-organization），分析語素義與詞義之間的非線性互動，試著發掘導致誤釋詞源的各種可能因素；一方面則以「認知語義學」（cognitive semantics）作為理論基礎，著力於語言系統與心理認知、身體經驗、社會文化等外部系統的互動，探究建構流俗詞源的心理機制及其動態歷程。

關鍵詞：流俗詞源、理據、內部形式、耗散結構、詞義演變

*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一、緒論

人類是終其一生都擁有強烈好奇心的物種，我們不僅僅只是活在當下，更會依據現時的處境揣度過去、預測未來。對於未知的事物，人們不僅要求能知「其所然」，更常有想要進一步追究「其所以然」的衝動，即使是日常言談交際中所慣用的熟悉詞語，有時我們也會試著刨根究柢地問：這些詞語最初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事物為何要如此命名？事物與稱名之間潛藏著何種不為人知的道理？舉例來說，人盡皆知「麻將」是中國的傳統賭具，但「麻將」一詞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呢？為何以「東西」二字來泛指各種具體或抽象的事物呢？又為何以「馬馬虎虎」一詞來形容某人行為敷衍隨便呢？這些活躍在口語言談中的慣用詞語，就連目不識丁的老嫗幼童亦能知曉其義，但若要精確地、合理地解釋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即是皓首窮經的飽學之士恐怕也會感到力有未逮。

名、實之間是否具有本質上的自然關聯呢？抑或純粹只是人為約定而成的結果罷了？自古以來，中外思想家對此論題有過不少爭辯。東漢劉熙《釋名·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若依照劉熙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觀點，詞語之構造有其必然的道理；換言之，語言符號(名)與現實世界(實)之間聯繫並非絕對任意的(arbitrary)，而是具有象似性(iconicity)，其中潛藏著可以論證的理據(motivation，義類)。¹然則，今人想要追溯詞語形式的構成理據有其困難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造詞理據大部分潛隱在語言編碼過程中，成詞時只稍微露出冰山之一角，與日常交際過程中人們使用詞語時所觸及的表層規約義有別；²二是，詞語的內部形式(inner form)³隨時

¹ 與任意性概念相對，象似性、理據性強調語言形式與概念之間存在自然聯繫或對應關係。張維鼎(2003: 40)辨析理據性與象似性的細微差異：「前者(理據性)強調形義間的內在自然關係；後者(象似性)強調形義間的鏡像反映。象似性應該是較原始直觀的理據」。

² 王軍(2005: 59)論述詞義的層次性，指出：「詞義既是豐富的，又有層次之分。第一層是表層規約詞義，即一般所說的詞義，它只包括那些具有區別作用和指稱作用的主要語義特徵和區別特徵，第二層是深層隱含詞義，包括那些反映事物次要特徵和人們主觀認識的語義內容。人們掌握了表層規約詞義，就掌握了基本詞義，可以把詞用對，而人們掌握了深層隱含詞義，就可以在使用時把詞用活、用好」。

³ 19世紀時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W. von Humboldt, 1767-1835)提出「內部形式」的概念，指在詞義最初形成之時，造詞者為反映事物對象的特點所採取的語法結構和語義結構，因其與被動的、靜態的外部語音形式兩相對比，故稱之為「內部形式」。學者通常將「內部形式」與「理

空的推移而逐漸趨於耗散，至今大多早已模糊難辨，甚或湮沒不存。儘管如此，人們為滿足「知其所以然」的好奇慾望，仍常以望文生義的方式，根據字面意義試圖逆推、重構出詞語的內部形式。

在嘗試還原詞語內部形式的過程中，詮釋者多以自我主觀的體驗為本位，根據自己對詞語字面意義的理解，大肆發揮聯想力與創造力，藉由類推、同化的心理聯想，將形式與意義脫鉤而難以索解的詞語，改換成自己熟悉的、發音近似的、或意義相關的字詞，重構出自以為合理的造詞理據。此種主觀比附、想當然爾的方式所推求出來的詞源，大多數禁不起科學驗證，不僅悖離真實，甚至詼諧可笑，德國語言學家佛爾斯特曼（Ernst Förstemann, 1822-1906）稱之為 Volksetymologie（英譯為 folk etymology 或 popular etymology），即本文所謂的「流俗詞源」（或稱為「俚俗語源」、「民間詞源」）。

儘管「流俗詞源」的現象由來已久，且廣泛地存在於各種語言之中，⁴但「流俗詞源」並未受到漢語研究者重視。依個人所見，最早以漢語流俗詞源為主題進行系統性論述者，應為俞敏〈古漢語裡的俚俗語源〉（1949）一文，該文中依《爾雅》的篇目分類，耙梳了 53 個出現在《切韻》之前的古漢語流俗詞源，但全文偏重在資料彙整，而欠缺深入地闡發。俞敏之後，「流俗詞源」的研究便又銷聲匿跡了，直至 1990 年代以後，隨著文化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的興起，學者才又開始關注「流俗詞源」的相關問題，諸如：伍鐵平（1994）、金基石（1994）、王士元（2000）、張紹麒（2000）、譚汝為（2003）……等人相繼以「流俗詞源」為研究對象，展開更具理論深度、更多元面向的闡發。

依照傳統的觀點，「流俗詞源」被認為是「土聖人」主觀比附所造成的曲解，因此，如何以科學方法考證出合理、正確的詞源，以辨識流俗詞源之謬誤所在，便成為學者努力的目標。本文則轉換視角，採納認知語言學的觀點重新估量「流

據」混用不分，唯王艾錄、司富珍（2002）持不同觀點，主張由兩個以上語素所構成的複合詞才有「內部形式」可言，單純詞僅有「理據」卻無「內部形式」。

⁴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專章討論流俗詞源，並舉法語為例，指出：「我們有時會歪曲形式和意義不太熟悉的詞，而這種歪曲有時又得到慣用法的承認。例如古法語的 *coute-pointe*（來自 *couette*“羽毛褥子”的變體 *coute* 和 *poindre*“紮縫”的過去分詞 *pointe*）變成了 *courte-pointe*“紮過的被子”，好像那是由形容詞 *court*“短”和名詞 *pointe*“尖端”構成的複合詞似的。這些創造不管看來怎麼離奇，其實並不完全出於偶然；那是把難以索解的詞同某種熟悉的東西加以聯繫，藉以作出近似的解釋的嘗試。人們把這種現象叫做“流俗詞源”。」（242 頁）

俗詞源」的正面價值，將「流俗詞源」現象定位為：詮釋者對模糊的造詞理據所進行的再創造，體現出詞語內部形式的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過程。⁵經此轉換之後，研究的重點便不再侷限於初始詞源的考證上，而是試圖以「流俗詞源」為窗口，窺探詞語內部形式編碼、湮滅、重構之演變過程。為達成此一預設目標，筆者參酌符號學的觀念與方法，分別從三方面解析「流俗詞源」：首先，探究人們如何透過詞語對現實世界進行編碼，釐清理據在不同語言符號層級的展現；其次，著眼於語言符號內部因素，參照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⁶協同學（synergetics）⁷等自組織理論，分析語素義與詞義之間的非線性（nonlinear）連結，試著發掘導致誤釋詞源的各種可能因素；最後，以「認知語義學」作為理論基礎，著力於語言系統與心理認知、身體經驗、社會文化等外部系統的互動，探究建構流俗詞源的心理機制及其動態歷程。冀望藉由本文論述，能稍加釐清以下幾個問題：

1. 造詞理據如何落實在語言編碼之中？理據性是否與任意性相互矛盾？
2. 詞語的內部形式如何隨著時空推移而趨於耗散，終至湮沒不存？
3. 人們如何依據現存的語言形式，藉由聯想、類推的心理機制，虛擬出流俗詞源？
4. 「流俗詞源」對於日常交際活動是否也有所正面助益？

⁵ 苗東升（1998：142-143）：「自組織過程是系統組分之間的互動互應過程，一個組分的行為變化，必然引起其他組分的回應，發生相應的行為變化，又反過來影響到組分，形成複雜的互動互應網絡系統。系統與環境之間也有互動互應，系統的每一變化都引起環境的回應，環境的每一個變化也引起系統的回應。正是在這種互動互應過程中，系統不斷試探、學習和自我評價，尋找新的結構和行為模式，接受環境的評價和選擇。因此，自組織過程必是一種動態過程」。

⁶ 劉衛平（2000：10）扼要地概括耗散結構的特質：「所謂耗散結構，就是指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開放系統，通過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從原有的混沌無序的混亂狀態變為一種在時空或功能上的新的有序狀態」。

⁷ 協同學是關於複雜系統如何通過子系統的協同行動而導致結構有序演化的一門自組織理論。協同學的創始者哈肯（2005：9）指出：「協同學的目標是在千差萬別的各學科領域中確定系統自組織賴以進行的自然規律。在人們最感興趣的事例中，亦即在創建新的結構或系統的宏觀狀態發生急遽變化時，協同學在發現其普遍規律方面最為成功」。

二、從語言編碼過程看詞語內部形式的體現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人們常想要進一步追尋詞語結構之所以然的原因，此種探赜索隱的衝動，自古至今，未曾稍絕。若想追究詞語構造的潛在動因，其先決條件便是必須相信「語言符號具有理據性」，否則溯源豈不是如同水中撈月般徒勞無功。然則，語言符號是任意的、無可論證？或者是有理據、可論證的？此一難題學者們至今仍然爭論不休。若是堅信語言符號具理據性，那麼便得解釋以下幾個問題：1.「理據性」與「任意性」是否相互排斥、難以並存呢？2.理據性從何而來？3.理據如何在語言符號編碼中體現？

（一）語言符號是否具有理據？——論語言符號的理據性與任意性

語言是人類最便捷有效的符號系統，自然成為符號學（semiotics）研究的主要對象。系統的符號學理論出現於 20 世紀初期，追根溯源，主要有兩大源頭：一是瑞士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的語言符號學；一是美國皮爾士（或譯為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一般符號學。兩種理論系統對於語言符號之構成、本質、意指過程（semeiosis）⁸均有不同看法，影響後來學者對於語言符號的認知。因此，想要釐清當代語言學家何以對語言符號之「任意性」或「理據性」產生爭辯，必得先從理論源頭上辨析兩種符號觀之根本差異。

1. 索緒爾符號學與任意性原則

索緒爾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其語言符號理論對後世影響不言而喻。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索緒爾明確地指出：「任意性」是語言符號的第一準則，此後，「任意性」原則普遍為形式主義語言學家所接納，成為現代語言學的根本性法則。究竟語言符號如何展現「任意性」呢？且看索緒爾（1916）的說明：

⁸ 張良林（2004：118）：「對皮爾士來說，意指過程（semeiosis）就是從符號到對象再到解事項的一個相對完整的過程，符號意義的產生就是符號、對象和代表項三者之間動態反應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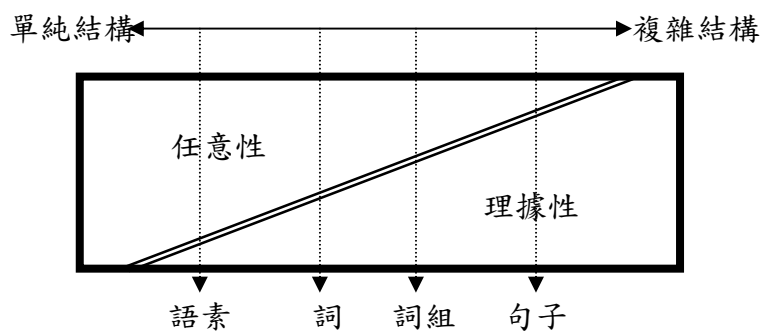
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的聯繫是任意性的，或者，因為我們所說的符號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聯結所產生的整體，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語言符號是任意的。例如：「姊妹」的觀念在法語裡同用來做它的能指的 s-ö-r (sœur) 這串聲音沒有任何內在的關係；它也可以用別的聲音來表示。語言間的差別和不同語言的存在就是證明：「牛」這個所指的能指在國界的一邊是 b-ö-f (bœuf)，另一邊卻是 o-k-s (Ochs)。(92-93 頁)

索緒爾認為符號由「能指」(音響形象)與「所指」(概念)兩部分所構成，兩者的關係猶如紙張之兩面，不可分割。在不同的語言系統中，不僅在音位的歸併、概念範疇的劃分上各自有別，「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連結更可隨意地自由選擇。除去少數擬聲詞與感嘆詞之外，符號的能指形式與所指概念之間並不存在自然聯繫或可論證的關係，此即所謂的「任意性」原則。

然則，語言符號具有層次性，「任意性」原則是否在各個語言層級中都能維持同等強制性呢？恐怕並非如此。索緒爾體察到：在不同的語言層級中，「任意性」的強弱程度並非絕對一致，而是有如連續體 (continuum) 般呈現出相對強弱的梯度變化 (見[圖表 1]所示)。因此，「任意性」又可再細分為「絕對任意性」、「相對任意性」兩大類。索緒爾之所以特意分出「相對性任意」，其用意在於進一步闡釋：隨著符號形式由低層的單純結構組合成較高層的複雜結構，「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可論證性亦隨之提升；換言之，在較複雜的結構層級中，任意性原則將受到理據的限制而削弱。索緒爾以法語的 dix-neuf (十九) 一詞為例，說明複合結構的「相對任意性」：就聚合關係而言，dix-neuf (十九) 與 dix-huit (十八)、soixante-dix (七十) 均含有共同語素 dix (十)，彼此之間可引發相似性的聯想；就組合關係而言，dix-neuf 由 dix (十) 和 neuf (九) 兩個語素的搭配組合而成，構詞時必須依循一定的語法規則，不再能夠隨意地自由變換。

從索緒爾的「相對任意性」概念中，可以察覺：在單純結構的層次中，「任意性」主宰著語言符號的運作，「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連結享有充分的選擇自由，顯現出無可論證之「絕對任意性」；一旦，符號結構由簡單趨向複雜，「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連結必將受到組合規則、聯想關係的制約，如此選擇自由將受到限制，漸次地透顯出可論證之理據。依個人之見，「任意性」與「理據性」

在不同語言層級中的消長態勢，當如下圖所示：



[圖表 1]

2. 皮爾士符號學與象似性原則

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理論從共時（synchronic）的視角出發，將研究對象限定在具有結構性、社會規約性的語言（langue）形式上，排除掉受語言系統外部因素影響而顯得變動不居、雜亂無序的個人言語（parole）現象。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雖將語言研究導向科學化路徑，但卻設定了一個孤立、封閉的靜態語言系統，既不從歷時（diachronic）的角度思考詞語意義如何生成、變化，也忽略個人主觀認知、現實世界對語言符號使用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基於此種靜態、封閉的語言符號觀，索緒爾只關注語言系統內部，自然而然地傾向於凸顯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而漠視「理據性」的存在。

索緒爾之後，繼起之結構主義語言學、生成語法學派，均依循著索緒爾的論點，將語言假想為自足的（self-containedness）、任意的封閉系統。然而，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認知語言學派崛起，索緒爾的「任意性」原則遭受到嚴峻的挑戰。認知語言學家反對形式語言學派的「客觀主義」（objectivism）思想，提出「體驗哲學」（embodied philosophy）⁹理論，主張：概念、範疇、意義等均非天生本有，而是在主體與客體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類經由身體各種感官與現實世界不斷互動，從而在大腦中凝結出若干基本的意象圖式（image schema）¹⁰與概念

⁹ 「體驗哲學」包含三項基本原則：1. 心智的體驗性；2. 認知的無意識性；3. 思維的隱喻性。王寅（2005）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理論有深入闡釋，請自行參閱。

¹⁰ 在不斷與環境互動的體驗過程中，大腦傾向將事件（event）所涉及的對象、動作、環境等要素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概括成典型場景（scene）來加以儲存，此即認知框架（cognitive frame）

範疇；當我們使用語言符號來表情達意時，大腦中所儲存的圖式、範疇也會投映在語言編碼之中，使得語言形式（能指）與現實世界或概念結構（所指）之間具有某種相映關係，此即所謂「象似性」原則。若是如此，則語言研究便不應該只片面強調「任意性」，更應將焦點轉移到「象似性」上，積極地從語言系統的外部因素中，尋求解釋語言生成、演變的動因。

尋根溯源，「象似性」的概念可追溯至皮爾士的符號學理論。皮爾士與索緒爾處在同一時代，但兩者的符號學理論卻有著明顯的分歧。隨著「任意性」與「象似性」爭論之白熱化，近幾年來，不少學者撰文辨析皮爾士與索緒爾二人在符號學觀點上的分歧，如：李巧蘭（2004）、郭鴻（2004）、張良林（2004）、張鳳與高航（2005）等人均對此一論題有過深入地討論。茲總結各家討論的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於下：

	索緒爾符號學	皮爾士符號學
哲學基礎	結構主義	實用主義
學科定位	符號學從屬於社會心理學	符號學為基礎性學科
研究目的	使語言研究躋升至科學地位	作為闡述邏輯的思維工具
應用範圍	語言符號（較窄）	自然符號（較寬）
基礎單位	單詞	命題（句子）
符號構成	二元：能指、所指	三元：代表項、對象、解釋項
符號屬性	強調任意性（“能指—音響形象”與“所指—概念”之間無自然聯繫）	正視象似性（符號形式與所指對象之間具有自然聯繫）
意指過程	意義由符號與同一系統內其他成分之間的相對關係所決定	意義產生於代表項、對象、解釋項三者之間的動態連結
符號系統	符號可斷絕主體、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繫而獨立存在，形成自足的、先驗的封閉系統	符號的解釋必須參照主體、客觀世界，形成具有體驗性、人文性的開放系統

[圖表 2]

由[圖表 2]可看出，皮爾士與索緒爾符號觀存在著許多歧見，個人以為其中

最關鍵性的差異在於：符號構成要素的不同。皮爾士依照自己的範疇觀，將符號構成要素分為三個範疇：¹¹代表項（representamen）、對象（object）、解釋項（interpretant），三位一體，緊密相連、相互牽動。¹²對比皮爾士的三元範疇與索緒爾的二元成分：皮爾士所謂的「代表項」相當於索緒爾的「能指」；「解釋項」則近似於索緒爾的「所指」，但索緒爾的「所指」是由社會群體共同約定的先驗存在，而皮爾士的「解釋項」則凸顯出個人主觀的認知在意指過程中的作用；至於「對象」一項，指稱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客觀對象（referent），此一要素在索緒爾的符號理論中排除在系統之外，皮爾士將其納入符號範疇，用以闡釋符號與現實世界間的連結所隱含的「象似性」原則，並依照符號與「對象」間象似性之強弱，將符號分成三種類型：圖像（icon）、指示（index）、象徵（symbo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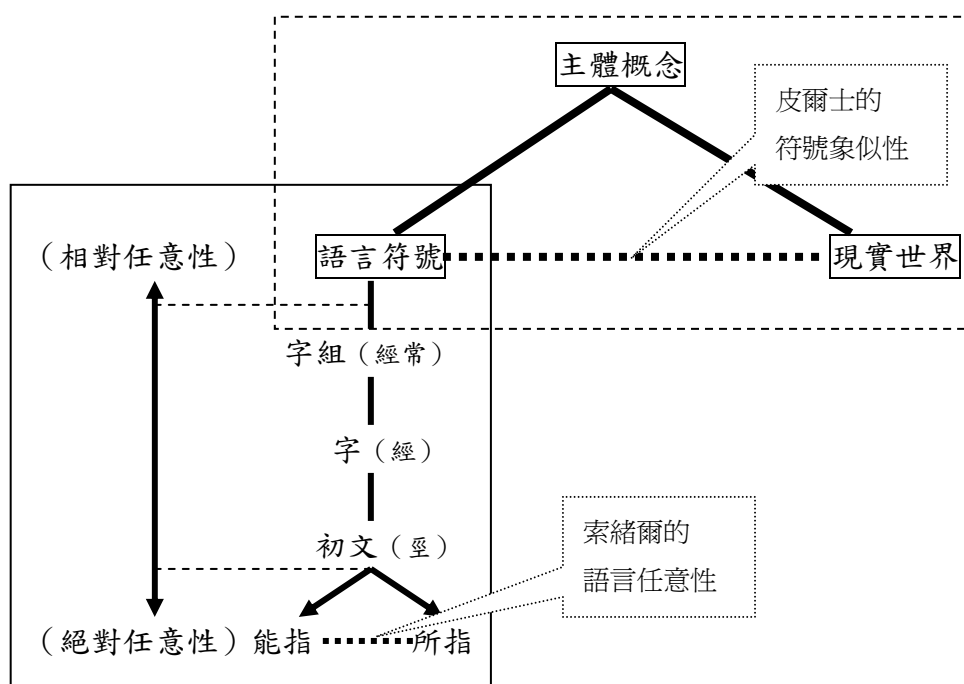
皮爾士意識到符號系統的開放性，透過「解釋項」凸顯出主體認知在符號意指過程的積極作用，並關注符號與概念結構、現實世界間的象似關係，為日後認知語言學奠定理論基礎。張良林（2006：115）評論皮爾士符號學的優越性：「雖然任意說和象似說本身觀點無法辨明孰優孰劣，但從方法論上講，象似說比任意說更勝一籌，因為前者以動態的方法將人的因素、指稱對象和歷史維度納入到開放的語言系統研究中，而後者以靜態的方法把語言看成是一個先驗存在的、自給自足的，能夠自行分解的封閉系統」。

3. 「任意性」、「理據性」之相反相成

經由上文討論，可知：「任意性」、「理據性」是相對性的概念猶如連續體之兩端，兩者相反相成，而非絕對對立、相互排斥；另外，索緒爾與皮爾士的符號

¹¹ 王銘玉（1998：1-2）指出皮爾士符號三分與範疇論之間的關聯：「皮爾士認為範疇應該建立在思維和判斷的關係邏輯上。任何一個判斷都涉及對象、關係和性質」這三者之間的結合。在語言中它表現為“主語—連詞—表語”的形式。換言之，任何判斷或命題成分都應包括：1. 第一項（表語）；2. 第二項（主語）；3. 第三項（連詞）。而且想要確定“第二項”（對象），就必須已經知道“第一項”（特性），並且通過“第三項”（連詞）將特性與對象相聯繫。這樣一來，皮爾士為人們勾勒出一個範疇表，它的構成要素只有三個範疇……」。

¹² 李巧蘭（2004：116）闡述皮爾士的符號構成論，指出：「代表項（有時皮爾斯也稱它符號）可以是實物、感官獲得的印象或者思想；對象可以是已存在的實體，也可以是頭腦中的想像物；解釋項即符號的意義，是指符號在人腦中喚起的認知，所產生的心理效果或思想，並且它本身也是一個符號。它們構成三位一體的關係（triadic relation），三者缺一不可」。



[圖表 3]

在「初文」層次，語音形式與概念之間的結合較為靈動自由，具有較強的「任意性」；¹⁴但當語言結構由簡單趨向複雜，即由「初文」→「字」→「字組」逐級提升，則語言形式與概念之間結合將受到系統中其他組合、聚合成分之制約，而湧現較強的理據性。以初文「𠂔」為例，「𠂔」(直)與[tcin]之間的連結似乎沒

¹³ 以往語法研究多採用西方的「詞本位」模式，將語言結構層次解為：語素→詞→詞組→句子→篇章。近來徐通鏞、潘文國等學者，針對漢語的語法特性而總結出「字本位」理論，認為形、音、義三位一體的「字」才是漢語編碼的基本單位。

¹⁴ 音響形象與概念之間是否具絕對任意性呢？對此學者仍有疑義。認知語言學傾向於支持“語音象徵”（sound symbolism）的論點，認為個別音素與概念之間亦存有自然的聯繫關係，例如：英語以 sn-居首的音節，發音時有強烈呼吸聲，常用在表現特殊聲響的詞語中，如：sniff（用力嗅聞、嗤之以鼻）、snuff（呼呼地吸）、snore（打鼾）、snort（哼著鼻子）；國語圓唇之合口音多用以表示「圓形」意象，如「圓」、「圈」、「圓」……等。然則，不合乎“語音象徵”的例證亦唾手可得，如：「球」、「丹」、「豆」……等圓形意象，發音時卻不具有圓唇合口的特徵。

有明顯道理，展現出「絕對任意性」；但當「𠄎」與其他形符分別組合成「經」、「莖」、「涇」、「頸」、「徑」、「脛」、「逕」等字，由「經」字組成詞組「經常」、「經典」等，則造詞理據便逐漸明晰可見，呈現出「相對任意性」。

仔細觀察「流俗語源」的現象，不難發現：人們試著探究語言的理據，大多集中在「字組」或「字」的層次，鮮少發生在「初文」或「句子」的層級。何以如此？經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如此推測：因「初文」層級的任意性明顯強過理據性，讓人們自覺難以從中找到可論證之理據，而「句子」層級則是理據性凌駕任意性，人們通常只需依據字面意義便可直接推知造句的內在理據，無須再額外費心地深入論證。唯有「字組」、「字」處在過渡階段，任意性與理據性之強度相當，兩者之間因拉扯而產生張力，雖說確切的造詞理據早已混沌不明，但人們卻仍然相信可從字面意義追溯造詞的內在理據，故敢勇於以己意逆之，致使流俗詞源的生成明顯集中在「字組」或「字」的層級中。

此外，語言研究者應當偏重理據性或任意性呢？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在此一問題上見解分歧。本文目標在於透過「流俗詞源」探求詞語內部形式的自組織過程，自然偏向於理據性的探討，傾向認知語言學的路徑。下文即依據皮爾士的符號學框架，結合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試著探究流俗詞源的生成、演變的自組織過程。

（二）造詞理據從何而來？——論範疇化、概念化

皮爾士認為每個符號都有兩個所指對象：一是「動力對象」（真正有效，但不直接呈現的對象），一是「直接對象」（符號所代表的對象），並進一步舉例說明：「當在沙漠裡，我們會有海市蜃樓一樣的幻覺，直接對象是一片綠洲，但是動力對象卻是在乾燥沙漠上的活動的熱空氣」。（轉引自瓦爾，2003：109）就語言符號而言，日常言談所使用的表層規約義直接指向現實世界，如同眼前所見之虛幻綠洲；相較之下，深層理據義便有如誘發海市蜃樓的沙漠熱氣一般，是促動語言符號產生、變化的潛在動因。

既然詞語普遍存有理據，那麼理據究竟從何而來呢？這問題得從心理認知上追究。人類的認知肇始於範疇化（categorization）、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人們面對五光十色、變化萬千的現實世界，必須依賴某些特徵、屬性將事物分門別類，藉以合同別異，方能在大腦中形成可長期儲存的概念。然則，大腦如何選擇適切的徵性作為劃分概念範疇的依據呢？首先，必須先以五官簿之，即透過身體各種感官與客觀世界產生互動；其次，再以心徵知，即藉由「注意力」的灌注將特定的感官刺激予以捕捉、放大。對於概念範疇化的心理歷程，即如荀子《正名》的闡述：「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知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雖說物體之形狀、氣味、顏色、聲響、觸感、質地、功能……等紛雜信息，不斷地通過各種感官平行輸入大腦，但多數信息在大腦中以非意識狀態進行處理，¹⁵唯有少數感官刺激能經過「注意力」放大、凸顯，而躍入意識空間為人們所感知。大腦意識將所感知到的外來刺激轉化成為表徵概念的特徵而加以儲存，並且進一步編入語言符號之中，在不同的語言層級中展現出或強或弱的理據性。由此可知，「理據」在信息的儲存、編碼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展現出多元面向：

- 理據是經由身體感官與現實世界互動所產生的。
- 理據是被大腦意識所捕捉、凸顯的信息。
- 理據是語言符號之所以如此編碼的潛在道理。
- 理據是事物之所以如此命名的內在因素。

以下茲舉「黑板」、「木耳」、「口紅」、「謝幕」四個詞語為例，展現各詞的「內部形式」及其與「詞義」、「外部形式」之關聯。

¹⁵ Lakoff & Johnson 在《體驗哲學》中提出「認知的無意識性」(the cognitive unconscious) 原則，指出：「有意識思維僅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之一角，保守一點說，無意識性思維至少佔 95%。而且，在有意識思維層面之下的，佔 95% 的無意識思維，形成和建構了所有的有意識思維。如果沒有這種無意識思維所起的這種成形作用，就沒有有意識思維」。(轉引自何自然，2006：48)

詞語	詞義（概念義）	外部形式		內部形式
		語音形式	語法結構	
黑板	用木頭或玻璃等製成的可以在上面用粉筆寫字的黑色平版	xeiŋ pan˧˥	定中結構	黑 ¹ 色的平 ² 板 ³
木耳	菌的一種，生長在腐朽的樹幹上，形狀如人耳，黑褐色，膠質，外面密生柔軟的短毛。可供食用。	mu˧˥ ə˧˥	定中結構	長在 ¹ 木 ² 頭上，狀如 ³ 人耳 ⁴ 的菌類
口紅	化妝品，用來塗在嘴唇上使顏色紅潤	k ^h ou˧˥ xuŋ˧˥	主謂結構	塗在 ¹ 口 ² 上使其 ³ 紅 ⁴ 潤
謝幕	演出閉幕後觀眾鼓掌時，演員站在台前向觀眾敬禮，答謝觀眾的盛意	cie˧˥ mu˧˥	動賓結構	布 ¹ 幕 ² 降下，演員答 ³ 謝 ⁴ 觀眾

[圖表 4]

由上表可看出：內部形式大多可以還原成述謂結構的形式，¹⁶性質與邏輯學的「命題」(proposition)相當。再者，觀察內部形式對於事物特徵、屬性的描寫，或用直述方式描摹事物本身的性狀、樣態，如：「口紅」；亦可經由隱喻、類比的方式引入其他事物特徵來加以說明，如：「木耳」一詞，以「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隱喻手法，引入人體（耳朵）特徵以說明物體形狀。

然而，我們必須再追問：哪些信息較容易引起注意而被意識感知呢？在不同語言中詞語的內部形式是否具有共性呢？人類的行為受到先天的生物基因（gene）與後天的文化基因（meme）的交相影響，在範疇化、概念化過程中，既顯現出普遍的生理共性，更見獨特的文化殊性。就其共性而論，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基於人類共通的生理反應與邏輯推理，因此縱使在無親屬關係的語言中，相同概念也可能具有共同的理據，伍鐵平（1994）、劉寶俊（1999）透過比較詞源學的研究，發掘出許多內部形式相同的例證：

¹⁶ 朱彥（2004：34）：「詞義和句義一樣，也都包含著場景，更重要的是，語義理解，尤其是對帶有隱含成分的結構作語義理解時，常常需要對成分之間的述謂關係進行還原。……述謂結構是語言結構中成分之間的必有語義關係，沒有述謂關係，一定的語義成分無法組成結構，無法對客觀世界作出指稱或陳述；不求助於述謂結構，人們無法對語義作出相應的理解」。

- 《尚書·康誥》：「如保赤子」，孔穎達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赤子」一詞的內部形式為「赤色之子」。¹⁷中國許多少數民族的語言中，表達“嬰兒”概念的語言形式與漢語一樣，均是由兩個語素所組成的複合詞，且其中一個語素具有「紅色」的意涵，如：

壯侗語族：傣雅語 lok⁸（仔）lian¹（紅） 傣德語 ʔe¹（仔）leŋ⁶（紅）

壯語 luk⁸（仔）din¹（紅） 布依語 ne²（仔）din¹（紅）

藏緬語族：基諾語 zo³³（仔）nə⁴⁴（紅） 阿昌語 tso³¹（仔）na⁵⁵（紅）

- 「瞳孔」因能映現出小小的人影，故以「孩童」為造詞理據，語義學家烏爾曼（S.Ullmann）發現世界上有三十餘種語言，不約而同地使用「孩童」、「學童」、「小男童」、「小女童」等詞作為「瞳孔」的造詞理據。如：

拉丁語 pupilla “女孤兒、瞳孔” 英語 pupil “學童、瞳孔”

法語 pulille “受托孤兒、瞳孔” 義大利語 pupilla “女學童、瞳孔”

西班牙語 nina “女童、瞳孔” 葡萄牙語 menina “女童、瞳孔”

馬來語 orangan（假人、影像）mata（眼睛）“瞳孔”

儘管不同語言的造詞理據存在著共性，但因文化、社會因素所造成的殊性更是明顯、易見。現實世界中客觀事物往往呈現出多種多樣的徵性，人們在與客觀世界的互動過程中，隨著身體經驗、社會環境、文化背景的差異，各自選擇其中某些顯著的特徵作為組構新詞、稱代命名的依據，致使相同事物在不同語言或方言中，各自形成不同的內部形式。以下茲舉「筆戰」、「眼鏡」、「地瓜」三詞為例，說明造詞理據的歧異：

- 漢語「筆戰」其內部形式為「以筆寫文章與人進行論戰」，但不同語言中

¹⁷ 關於「赤子」的理據，除「赤色之子」一說外，歷來學者尚有不同說法：或以為「赤」通「尺」，清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搓庵小乘》：「尺字古通赤。……赤子者為始生小兒僅長一尺」；或以為「赤」為「赤裸」之意，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按古人言赤，猶今人之言光。于文，赤從大火，大火則光見矣，故光與赤義相通……嬰兒初生，惟有肉體而已，故曰赤子」。根據劉寶俊（1999）透過不同語言之詞源對比，得知「赤」字應當解作「紅色」較為準確。

與漢語「筆戰」相同概念的詞語，卻有著不同的內部形式，如：俄語 война ченилми「用墨水作戰」；英語 paper war「紙戰」；法語 guerre de plume 與德語 Federkampft 或 Federkrieg「鋼筆（尖）之戰」。（伍鐵平，1994：2）

- 漢語的內部形式為「架在[眼]睛前的[鏡]片」，選擇「使用場所」作為凸顯的特徵；英語 glasses (glass+es)，則指以兩片玻璃做成的物品，凸顯「材料」的特徵；英語 spectacles (spect-)，詞根 spect-意為“看”，凸顯出「功能」的特徵。（王寅，2005：56）

- 「地瓜」在中國各地有不同的命名理據：

從出處和產地命名：「地瓜」（長在地下），「山芋」（來自山地），蕃薯（出自外地）。

從外表的顏色命名：紅薯、白薯、紅苕。

從味覺和視覺命名：甘薯（味覺甘甜）、涼薯（取其觸覺）。

從外在的形狀來命名：豆薯。（王寅，2005：56）

藉由上述例子，觀察相同概念在不同語言的「內部形式」差異，可看出其中隱含著各民族對事物的觀看視角與心理聯想，同時也能體察到不同的「語言世界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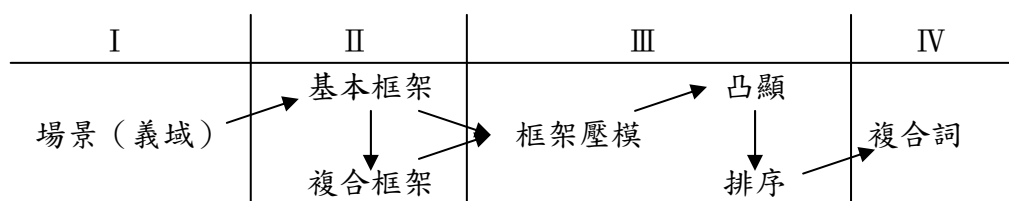
（三）理據如何以語言符號編碼？——論詞彙化

人類自從有了語言之後，便將範疇化的結果藉由編碼過程凝固在語言符號之中，此種藉由語言符號編碼以展現概念範疇的過程，或稱之為「詞彙化」（lexicalization）。¹⁸如上所述，人們基於身體經驗為現實世界劃分範疇，概括成以命題形式呈現的概念。然則，欲將心中概念編成詞語符碼，一方面受到語言線性原則的限制，一方面為求語言的經濟性效益，通常將述謂結構的命題提煉、壓

¹⁸ 「詞彙化」一詞有不同的意涵：通常語言學家以「詞彙化」指稱結構鬆散的詞組凝固成詞；或將黏著詞綴轉化成可獨立運用的詞。本文中所謂「詞彙化」則是指說話者的內在的概念結構落實為外顯的詞語符號之編碼過程。

縮，以詞或詞組形式呈現。呂叔湘《語文常談》描述詞彙化的過程，指出：「外界事物呈現無窮細節，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腦子裡來，可是語言沒法兒絲毫不漏地把它們全部表現出來，不可能不保留一部份，放棄一部份。……語言的表達意義，一部份是顯示，一部份是暗示，有點兒像打仗，佔據一點，控制一片」。(59 頁)然而，在造詞的過程中，哪些成分必須保留？哪些成分可以放棄呢？值得深入探究。

朱彥(2004:265)將複合詞的語義構詞過程，分解成以下四個步驟：



[圖表 5]

解說：

- (I) 確定複合詞兩詞素所要表達的語義場景，亦即確定兩詞素所能概括的最大義域。
- (II) 如果場景非常簡單，只涉及一到兩個場景角色，用基本框架確定其構詞模式。若場景複雜，涉及多個場景角色，且角色與角色之間又可構成一些小場景則轉用複合框架確定其構詞模式。
- (III) 從一個帶多種成分的語義框架中，提取兩個凸顯性的成分，並依照一定的順序排列。
- (IV) 輸出成為複合詞。

依照朱彥(2004)的語義構詞模式，茲舉以下數例，說明造詞者如何提取詞語內部形式之語義特徵使之形式化，藉以觀察語素與內部形式之間的語義聯繫。

●「臥病」：(a：臥)，因為，(a：病)¹⁹

¹⁹ 朱彥(2004)借用「述謂結構」理論來描寫詞語的語義結構，以構詞語素充當論元和謂詞，透過形式化的公式、符號解析詞語的語義結構，以「臥病」一詞為例，該詞的語義框架為「事件 1—原因關係—事件 2」，屬複構式複合詞，可以表述為：(a：臥)，因為，(a：病)，顯示「臥病」內含兩個簡單述謂結構，分別以()來表示(若為降格述謂結構則以〈〉表示，如「白菜」一例)；“a”代表不必詳細補充其語義內容的論元；“臥”與“病”則為一元謂詞，其與論元 a 之間以“：”隔開。關於朱彥(2004)所使用的各式符號及其意涵，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逐一詳細說明，請讀者自行查閱原書。

- 「白菜」：〈菜，有，(菜幫：白)〉
- 「湯匙」：(人，舀，湯)，憑藉，匙
- 「陣亡」：(a：亡)，在，陣地
- 「天牛」：〈(蟲：飛)，在，天空〉，像，牛
- 「睡蓮」：〈(蓮：關閉)，在，夜間〉，像，〈(人：睡)，在，夜間〉

由於語義構詞過程中，只能有部分語義成分被提取、凸顯而浮上台面成為構詞成分，其他的語義成分則被隱匿在表層之下，如：「天牛」一詞，隱藏了「蟲」、「飛」等語義成分，使得構詞成分之語義關係曲折、跳接而不夠豁顯，必須仰賴外部環境因素加以補充，才能完整解讀。此外，對於名物的命名，經常利用隱喻手法接納來自其他範疇之具象特徵，藉以描摹事物之情貌、性狀，如：「睡蓮」引入「人——睡眠」的模式來描寫蓮花之開閉，致使構詞成分間的語義跨度過大，同樣也得參照造詞時的心理聯想、文化環境，才能領悟真正的造詞理據。然而，隨著時空變異，人們逐漸失去造詞當下的文化語境，若詞語構詞成分間的結合關係太過曲折，或是語義跨度過大，後人便難以準確回溯最初的造詞理據，只能憑著自身的主觀理解，以現時熟悉的詞語替代陌生的構詞成分，得出自以為合理的解釋，「流俗詞源」便是在此種意義跳接、不連續的境況下孕育而成。

三、詞語內部形式的自組織過程

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結構模式與表現形態，這些複雜的結構、形態是如何產生的呢？如何產生變化？在繁複表象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某種簡潔的、普遍性原理呢？這些難解的謎團，始終是古聖先哲費盡心神所想要揭露的奧秘。如上所述，語言是開放性的系統，在言談交際的過程中，語言符號不時與使用者的概念結構、現實的客觀世界緊密連動。語言符號如何生成？如何適應交際環境的變異而自我調整呢？這無疑是語言研究者無可逃避的重要課題，誠如徐通鏞（1997：-21）所言：「我們認為語言研究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弄清楚語言對現實的編碼規則以及這些規則如何在交際中進行自我調整，以適應和滿足不斷增長的交際需求」。

「流俗詞源」是為適應交際環境變異而產生的理據重構，透過「流俗詞源」這扇窗口，得以讓我們窺探語言系統的編碼規則及其歷時性的自我調整。下文借用熱力學的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等自組織理論，試著解析詞語內部形式的自組織過程。

（一）自組織理論與語言研究

1859年，達爾文（C. Darwin, 1809-1882）《物種起源》提出劃時代的「進化論」觀點，揭露大自然如何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項簡單的法則化育萬物，解釋生物個體如何改變外在形態以適應環境變遷，演示物種演化如何從簡單走向複雜、從無序走向有序。「進化論」展現出一種不斷向上、進步的發展世界觀。然而，自然萬物的演變過程並非總是向上、進步的，如果說「進化論」所展現的是自然演化過程中的生成的、樂觀的一面，那麼「熱力學第二定律」²⁰則展現了寂滅的、悲觀的另一面。

1864年，德國物理學家克勞修斯（R. Clausius, 1822-1888）提出「熵」（entropy）的概念，以定量的形式表述「熱力學第二定律」，指出：在孤立封閉的系統中，熱能總是從高溫物體傳導至低溫物體，此種熱傳導過程具有不可逆性，且有效的能量在不斷傳遞過程之中會逐漸耗散，而無法再重新回收、運用（熵增），隨著熵的不斷增加，系統終將歸於死寂而呈現出無序的狀態。如此看來，「熱力學第二定律」主張在平衡狀態之下，系統將由有序逐漸轉向無序，似乎恰與「進化論」所預期的方向相反，悲觀地描繪出一幅不斷走向退化、死寂的消頹圖景。

「進化論」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各自展現自然演化的一個面相，兩者看似矛盾、對立，其實不然。在1970年代之後，隨著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等自組織理論的興起，兩者之間的矛盾得以調和。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比利時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 1917-2003）從事非平衡態熱力學的研究，創立了耗散結構理論，聚焦於非平衡系統的自組織現象上。根據耗散結構理論觀點，自組織系統的生成必須滿足以下幾項要件：

²⁰ 「熱力學第二定律」不僅適用於自然科學領域，甚至延伸到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研究中。英國作家史諾（C.P. Snow, 1905-1980）《兩種文化》（1959）談及：「人文知識份子不懂熱力學第二定律，就好像科學家未讀過莎士比亞一樣令人遺憾」。

1. 首要條件——系統必須處於開放的狀態，即能不斷同外界進行著物質與能量的交換。
2. 必要條件——系統必須處在遠離平衡的狀態的非線性區。
3. 內在機制——系統內部包含許多不同層次的單位，彼此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存在著非線性的複雜關係。
4. 觸發機制——開放系統經過隨機漲落（fluctuation）的放大而產生突變，使得混沌無序的狀態轉變成新的有序結構。

耗散結構理論以整體、有機、動態的觀點，探究系統的非平衡態、不可逆過程與非線性特徵，不僅劇烈地撼動了以來牛頓強調有序、均衡、靜態的機械論宇宙觀，更激發一種新的科學思維方式，從動態的角度思考系統的生成機制與動態演化。耗散結構理論具有強大解釋力，因而能跨越了學科之間的畛域，廣泛地滲透到生命系統、社會系統與人文系統的研究中，近來也逐漸受到語言學者的關注。

語言系統為了能在不同的交際環境中發揮其功效，結構形態必須適應環境變化而加以機動調整。語言系統如何生成？促使語言系統發展、變化的動力何在？這些問題是所有語言研究者所追尋的哲人石（Philosopher's Stone），耗散結構理論為我們指引了新的尋找方向，警醒我們應當留心語言系統的自組織過程。徐通鏘（2005：18）注意到了語言系統的自組織性，指出：「語言系統由各種大小不同的結構單位相互依存，相互制約，有層次、有規律地組成一個高度有序的結構，使之成為人們交流思想的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它的運轉和演變動力不是來自外部，而完全依靠語言內部各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其中一個結構成分的變化往往會引發其他結構成分的變化。語言系統具有很強的自組織性特點」。

觀察語言系統的歷時演變，可以輕易地察覺到：詞語內部形式日益崩離、瓦解，例如：漢字形體由具象走向抽象、音義之間的連結趨向任意、語素與詞義之間的對應關係傾向於非線性……等，凡此無不顯示出系統中的「熵」（entropy）值不斷增加，致使系統朝向遠離平衡的無序狀態發展。雖說不能辨識詞語內部形式並無礙於日常交際，但卻便不利於詞彙的理解與記憶。人們為了使語言符號更具象似性、理據性，必須從語言系統外部吸收資訊以增加「負熵」，考慮語言系統與心理認知、身體經驗、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方能將無序轉化成有序而達到

新的平衡狀態，流俗詞源便在「逆熵」的過程中產生。因此，個人以為：自然語言是一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詞語內部形式的動態演化，正體現出耗散結構（非平衡系統）的自組織過程。

（二）內部形式模糊——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

1. 流俗詞源的生成條件

大腦能主動地整合感官所輸入的各種刺激，建構出有意義的信息。Hawkins & Blakeslee《創智慧》：「大腦是一個喜歡建構模式、做創新預測的器官，但它的模式與預測很容易就將似是而非誤以為是正當可信的。我們的大腦不停的在尋找形態並做出類比，假如找不到正確的相關，大腦就會去接受不對的」。(244 頁) 儘管大腦具有主動建構信息的趨向，但並非所有詞語都有機會產生「流俗詞源」，唯有詞語內部形式的模糊度超過一定閾值，遠離對字、詞意義的常規性認知時，才具備產生流俗詞源的要件。那麼如何能夠判定詞語是否遠離了平衡狀態呢？王艾錄、司富珍（2002：224-227）歸納出語素義、詞義與內部形式六種對應類型（如[圖表 6]所示），對比下列類型，可以觀察字義與字組義的對應關係，藉此作為推測流俗詞源產生的可能性：（以灰底顯示之欄位表“晦暗不明”之義）

類型/詞語	字義（語素義）	語法結構	內部形式	字組義（詞義）
I. 牛車	牛、車	定中結構	牛拉的車	牛拉的车
II. 宸翰	宸（帝王）、翰（筆）	定中結構	帝王的筆跡	帝王寫的字
III. 黑洞	黑、洞	定中結構	黑色的洞	恆星演變的最後階段。中子星內縮而成的巨大引力場，使得它所發射的電磁波都無法向外傳播，變成看不見的孤立天體。
IV. 貓魚	貓、魚	定中結構	餵貓吃的小魚	餵貓吃的小魚
V. 花生	花、生		落花而生果實	一年生草本植物，葉

		?		子互生，有長柄，小葉倒卵形或卵形，花黃色，子房下的柄深入地下才結果。果仁可榨油，也可以吃。
VI.慈烏	慈(慈孝)、烏(烏鴉)	定中結構	黑色的烏鴉	鳥，嘴大而直，全身羽毛黑色，翼有綠光。

[圖表 6]

就上表六種類型觀之，何者語義結構類較型容易生成「流俗詞源」呢？個人以為：內部形式模糊是「流俗詞源」產生的必備條件；除此之外，整體詞義與個別字義是否呈現非線性關係——即整體詞義無法直接由個別字義疊加而成，更是能否促動「流俗詞源」的重要關鍵。上表中之第 I 類型，內部形式與字義、詞義間的對應關係十分，大腦不需再耗費資源重新建構理據；第 II 類型正好相反，不論是內部形式、字義、詞義均湮滅不明，沒有足夠的信息可供建構詞源，由此可以推斷：第 I、II 類型產生流俗詞源的機會很低。第 III、IV 類型，內部形式雖晦暗難辨，但整體詞義不明，因而無法清楚看出個別字義間的對應，同樣也難以直接形成「流俗詞源」，必須先翻查辭典先獲取整體詞義，再視字義與詞義是否具有非線性關係而定。至於第 V、VI 類型，內部形式既晦暗不明，且字義、詞義間明顯具有非線性關係，此二類型最有可能生成「流俗詞源」。根據以上討論，可依上述六種類型生成「流俗詞源」之機率高低排序為：I、II < III、IV < V、VI。

2. 致使內部形式模糊的原因

依據皮爾士符號學理論，符號系統的運作是處在開放的狀態之下，「內部形式」與「語言符號」、「現實世界」之間相互連通、彼此影響。當符號中的任一要項分產生變化時，連帶也引起其他部分產生回應，進而重新整合出新的內部形式。導致內部形式湮滅的原因為何？從符號學的角度加以檢視，個人以為可大致歸納出以下三項基本因素：概念結構的耗散、符號形式的訛變、現實世界的變遷。以下援引張永言（1981）、王艾錄、司富珍（2002）、張紹麒（1999）……等對流俗詞源的考證結果作為例證，逐項探討內部形式模糊的原因。

(1) 概念結構的耗散

人類依照事物特徵劃分概念範疇，但為適應現實世界與交際環境的不斷變異，詞語在使用過程中常藉由泛化、隱喻、轉喻的方式衍生新義，如此將導致詞義將逐漸偏離原有的概念範疇、逐漸削弱典型的語義特徵，從而使得造詞理據呈現出模糊、無序的不穩定狀態，此種概念結構趨向於模糊、無序的現象，稱之為「非範疇化」(de-categorization)。²¹例如：「女」字原本含有「卑小」語義特徵，現今此特徵已湮沒不存；又「陰王」廟，陰、王二字原為並列結構，後來被理解為偏正結構。

概念結構耗散致使詞語內部形式模糊，一旦詮釋者以個人主觀意念重構理據，便衍生出流俗詞源。如以下數例所示：

●短小之牆→狀似女陰之牆。

「女牆」，《現代漢語辭典》：「城牆上面呈凹凸型的短牆」。劉熙《釋名·釋宮室》：「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牆，言其卑小，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吾三省《古今詞語通俗類解》：「古代戰爭以城池攻守為主，把城上小牆建成形似女陰的凹凸形，並稱之為女牆，其用意是把它作為神物來供奉和瞻拜，希望在戰爭中得到神的庇護，從而獲致勝利」。「女」字蓋取其卑小之義。後來「女」已無卑小之聯想，於是「女牆」之理據被誤釋為「城上小牆似女陰之形」。(王艾錄，2006：187)

●陰、王→陰間之王。

四川酆都縣（今屬重慶市）東北隅有座平都山，相傳漢代時有陰長生、王方平二人在此山修道成仙，後人建「陰王廟」奉祀兩位仙人，「陰王」本是兩人姓氏之合稱，後來卻被誤解、訛傳為「陰間之王」，連帶著將酆都一地也塑造成冥王所居住的陰曹地府。(張永言，1981：144)

²¹ 劉正光（2005：30）指出語言非範疇化具有下列幾項特徵：1.在語義上，語義抽象與泛化是非範疇化的前提；2.在句法形態上，範疇的某些典型分佈特徵（句法／語義特徵）消失，範疇之間的對立中性化；3.在語篇和信息組織上，功能發生擴展或轉移；4.在範疇屬性上，由高級範疇屬性成員變成低範疇屬性成員或發生範疇轉移。

●髀股→屁股。

「髀」為大腿，與「股」的意義相近，兩字連言而成同義複詞。《說文》：「股，髀也。髀，股也」。《段注》：「髀者，股外也。此云髀者，專言股後」。王筠《句讀》：「今俗連言之髀股」。然則，「髀」字使用頻率低、較為冷僻，故以日常習見之「屁」字替代。（王艾錄，2006：193）

●鷺烏→慈烏。

鷺烏，即黑色的烏鴉。《大戴禮記·夏小正》：「十月黑鳥浴。黑鳥者何也？烏也」。《廣雅·釋鳥》：「慈烏，烏也」。即如張永言（1981：144）所述以「茲」得聲之字多有「黑色」之義，後來此義逐漸消散而不為人所熟知，後人遂熟悉之「慈」字來替代，烏鴉於是成為「慈孝之鳥」，進一步又虛構出烏鴉反哺的傳說。（張紹麒，2000：97）

（2）符號形式訛變

語音常隨著時間推移、空間轉換而有所偏異，當詞語音讀幾經轉變之後被寫定，詞語原有的內部形式多已崩解、消亡，人們以望文生義的方式追溯詞源，自然不免與原本理據有所悖離。此外，外來語譯音字、假借字均屬「依聲託事」，在譯音、借字之時只注意與原詞之間的聲音相似，原有詞語的理據已被拋棄，後人未經科學性考證而逕以常見之字義加以解讀，謬誤之處亦在所難免。以下將符號形式變異分成兩大類型：

a. 語音訛變：

錢鍾書《管錐編》列舉許多因語音訛變而產生的主觀附會，云：「俗傳人神形貌，固有孳生於文字者。……樊須像作多髯人，諧其名音“繁鬚”；冉耕為牛王，廟壁畫牛百頭，以其字“伯牛”；伍員、杜甫合祀，伍為男，面茁“五髭鬚”，乃字“子胥”之諧音，杜分身為“十姨”，乃官“拾遺”之諧音，作姬妾以侍。莫非望文生義，因聲起義，由誤會而成附會」。（1014 頁）

●尺口→虎口。

「虎口」，《現代漢語辭典》：「大拇指和食指相連的部分」。古人以肢體為

測量長度的單位，以拇指與食指相連部分為度，稱為「尺」。《漢書·律歷志上》：「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尺者，莧也」。「尺」[*tiak]、「莧」[*oak]上古屬鐸部，或因保留古音而訛讀為「虎」[*xa]（上古魚部）。²²孫常敘《漢語詞彙》直接從字面解讀：「因為大拇指向外分張時，它和食指等其餘四指的距離從側面看來好像張開虎口似的」。（張紹麒，2000：33）

●握髮→惡發。

五代十國，吳越王錢鏐（852-932）建「握髮殿」，殿名源自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之典故。百姓之方音訛讀為「惡發」，誤為口語的「發怒」、「生氣」之意。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遂謂其處曰：此錢大王“惡發殿”也」。（張永言，1981：143）

●木樨肉→木須肉。

「木樨」通稱「桂花」。北京口語忌諱說「蛋」字，因打碎的雞蛋經過烹調之後顏色、形狀與桂花近似，故以「木樨」代指「雞蛋」。「木樨肉」即是雞蛋炒豬肉，因「木樨」[mu ci]二字連讀時，語音產生順同化作用而訛讀為「木須」[mu cy]，後人不解「木須肉」即是「木樨肉」之音轉，或將「木須」解釋為「食材均切成條狀，猶如加工木材剩下之木屑」，或在食材中另外加入「木耳」以符合「木須」之名。

●荊山玉→金鑲玉。

「荊山之玉」即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於荊山，進獻楚王，初不為王所信，致雙足被刖，直到文王時方從玉璞中得到美玉的故事。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後人因語音訛變而讀為「有眼不識金鑲玉」。

²² 關於「尺」、「莧」、「虎」三字之上古音值擬測，參考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

b. 誤解通假字、譯音字：

●旁→房。

《史記·秦始皇本紀》：「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索隱》：「此以其形名宮也。阿房，後為宮名」。後人不識阿房宮之「房」字乃「旁」之假借，而誤解為「宮殿之名」。(張紹麒，2000：43)

●瑪瑙→馬腦。

「瑪瑙」為梵文 *asmagarbha* 的譯音，李時珍《本草綱目》：「瑪瑙，玉屬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因以名之」。如此，則將對外來詞的音譯誤釋為「玉石有馬腦之紋路」。(王艾錄，2006：168)

●琥珀→虎魄。

琥珀為突厥語 *xubix* 的對音漢字。李時珍《本草綱目·木部》「琥珀」條：「虎死則精魄入地化為石，此物狀似之，故謂之虎魄。俗文從玉，以其類玉也」。(張紹麒，2000：149)

(3) 現實世界變遷

現實世界滄海桑田、變動不居，以往用以命名的顯著特徵，可能隨著環境變異而消失不存，後人因此失去將語言符號與現實世界聯繫的紐帶，只能依照現今實況重新建構理據。

●苧麻→駐馬。

河南省駐馬店市古時盛產苧麻，有村名為「苧麻村」。後因不產苧麻而成為驛站，因而被誤解為「駐馬店」。(張紹麒，2000：29)

●驚閨→金貴。

「驚閨」為古時磨鏡人所持之成串響鐵，執業時將鐵片碰擊成響以代替吆喝。段長基《談徵·物部》據《齊東野語》：「用鐵數片長五寸許，闊二寸

五分如拍板樣，磨鏡匠手持作聲，使閨閣知之，曰驚閨」。而後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驚閨」一詞不再為今人所熟知，改以「金貴」替代之。（張紹麒，2000：31）

達爾文的進化論演示著自然界中「適者生存」的真理。然則，不僅生物個體必須因應環境變化方能獲得生存發展，詞語內部形式的演化亦是如此。由上文例證中，我們可以輕易地察覺到：語言是個開放性系統，在言談交際的過程中，「語言符號」、「內部形式」、「現實世界」三個要項之間相互連結、彼此制約，一旦某個要項產生變異，便會引發其他要項也產生連動的變化。

（三）、重構內部形式——流俗詞源的生成與演化

1. 字義與字組義間的非線性聯繫

苗東升（1998：140）闡釋非線性原理，指出：「滿足疊加原理的線性系統無法產生整體突現性，整體突現性是系統組成成分之間、系統與環境之間非線性作用的產物」。系統內部成分間的非線性聯繫是激發自組織活動的內在機制，就詞義系統觀之，如：「紅衣」＝「紅色的」＋「衣服」展現出簡單疊加之線性關係與均衡之狀態，因而難以促動內部形式進行重構；相較之下，「話梅」≠「說話」＋「梅子」，展現出「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非線性關係，系統遠離平衡狀態，具備重構內部形式的基本要件。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追問：詞語內部形式的自組織過程中，大腦是如何運作的呢？大腦如何能根據個別字義突現出字組意義呢？Hawkins & Blakeslee（2006）探索人類如何創造智慧，指出：大腦新皮質最重要的功能是「利用記憶作出預測」，當我們的感官接收到外界大量湧入的信息時，必須先經過主動分析、整理的步驟，並與大腦記憶中已經存有的概念框架產生連結、進行對比；因此，當人們面對內部形式模糊的詞語時，自然會以舊有的概念結構加以填補（fix in），將無意義的詞語重新加以串聯，作出自認為最合理的預測。因此，「流俗詞源」的形成可說是大腦依據既有的記憶，對殘缺的、不連續的字面意義加以填補、完形後所作出的預測。瞭解大腦運作的原理，再結合自組織理論的觀點，有助於我們

揭露內部形式演化與生成的奧秘。

(1) 內部形式的湮滅與重構

詞語內部形式如何崩解？如何重構？利用以下的連續圖象，恰可形象地展現詞語理據湮滅與重構的歷時演化過程。左上圖為正面的男人臉形，但線條（如同個別字義）逐漸產生細微的變異而偏離原有的平衡狀態，無法再直接與原有圖形（詞語內部形式）緊密相扣，此時圖像便開始由有序轉為無序；處在遠離平衡狀態的情境下（右上圖、左下圖），鑑賞者必須結合外部相關資訊，參照自身的概念結構重新賦予各線條新的意義，信號方能逐漸由無序轉為有序而重新達到新的平衡，至右下圖，便完全地轉化成屈腿的女人側面。



[圖表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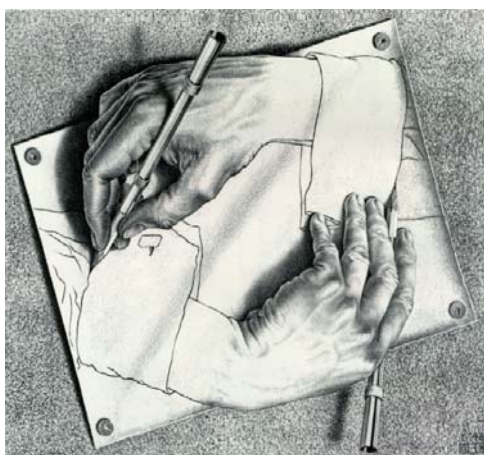
由上圖可看出：從男人臉形（左上圖）至屈腿的女人側面（右下圖），在中間過渡階段（上三至下二），線條與圖像之間具有非線性關係，線條的細部調整將對畫面的詮釋產生重大影響，促使圖像經歷了「見山是山」（平衡）→「見山不是山」（遠離平衡）→「見山又是山」（新平衡）的歷程。同理可證，流俗詞源的生成亦應是如此，字與字組之間呈現非線性關係，故能在詞語內部形式湮滅的前提下，經過後人重新建構出來的新平衡。

(2) 詞語內部形式的心理機制

如前文所述，「流俗詞源」產生的關鍵在於：字組意義的呈現具有突現性（emergence），亦即字組整體意義並非由個別字義直接疊加而成。理解字組義的

過程有如玩拼圖遊戲，大腦中的信息傳輸方式：一方面字義由下向上（bottom-up）相互統合而成字組義，一方面字組義則由上而下（top-down）反過來支配對個別字義的解釋，兩者之間相互反饋，呈現出非線性特徵。

哈肯（H.Haken）的協同學從微觀角度闡釋系統演化的動力學機制，以「序參量」（order parameter）描述系統由無序轉化成有序的規律，在《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一書中指出：「單個組元好像一隻無形的手促成的那樣自行安排起來，但相反正是這些個單元通過它們的協作才轉而創建出這隻無形的手。我們稱這隻使一切事物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的無形之手為“序參量”。」（頁7）埃舍爾（M.C.Escher, 1898-1972）的石版畫《畫手》（1948，如[圖表 8]所示）正形象地展現出系統內部不同層次單元上下反饋的特性。



[圖表 8]



[圖表 9]

此種反饋原理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以視覺為例，我們在觀看[圖表 9]時，必須在凝睇（Gazing）與瀏覽（Browsing）之間不斷轉換，以部分到整體、整體到部分交互運作的動態方式觀照畫面，方能從一堆無序的墨跡中生成有序的信息——大麥町狗。除了圖像的視覺認知之外，對於詞語理據的認知過程同樣也涉及不同語言層次間的相互反饋。以下參考俞理明（2003）對「香瓜子」來源和生成機理之考察，試著解說人們對詞語內部形式的認知過程。

「香瓜子」是流行於上海、杭州一帶之吳語方言詞，其實指的就是向日葵的籽粒，又可稱為「葵花子」、「葵瓜子」或「朝陽瓜子」。俞理明（2003：88）察

覺到“香瓜子”是個不合乎常規造詞方式的非理構詞，指出：「不論分析成“香瓜／子”（香瓜的籽粒），還是“香／瓜子”（香的瓜子），都有悖於事實：“香瓜子”根本不是瓜的籽粒，它與香瓜或其他任何一種瓜都沒有關係。“香瓜子”的“香”也不同於“香瓜”的“香”，因為它本身並沒有特別的香氣。在這個詞的構詞成分中，“香”和“瓜”都不能按它們的通常意義來理解，是非理的」。

「香瓜子」是如何創造出來呢？俞理明（2003：88）從詞彙學的角度分析，認為「香瓜子」之所以成為非理構詞是由三種歷時變化因素作用所致：詞義感染、錯合感染、縮略，並試著勾勒出的演化軌跡：「“葵花子”受瓜子類食品名稱的類推影響，發生認識偏差，通過詞義感染變成“葵瓜子”；“葵瓜子”中的“葵瓜”又與向日葵發生錯合感染，並伴隨向日葵的縮略，形成了“向瓜子”，又在詞義感染的作用下寫成“香瓜子”」。「香瓜子」的形成過程如下所示：

葵花子 → 葵瓜子（朝陽瓜子） → 香瓜子
 向日葵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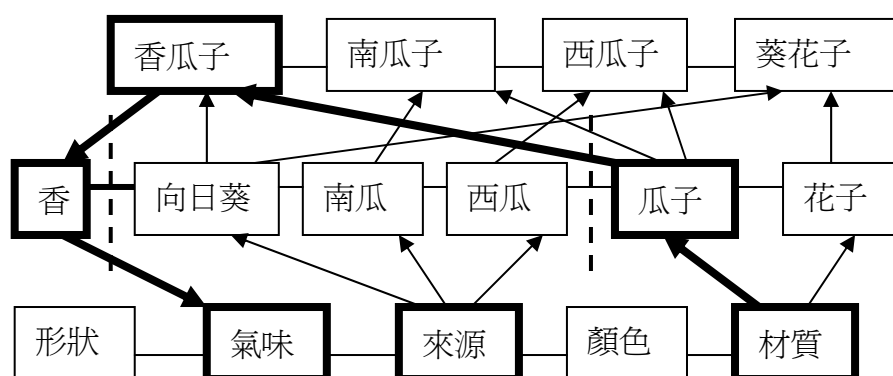
俞理明從宏觀角度闡述「香瓜子」形成的邏輯過程，但更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此類詞語的造詞理據，顯然與所指對象的客觀徵性有所悖離，在取象命名時，應遵循哪些基本原則？²³事物屬性特徵在大腦中如何傳遞、連結呢？語言系統中，不同結構層次的組成成分又是如何相互協調、彼此制約？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再進一步深究的問題。

分析名物命名的結構，通常包含著「類屬」、「種差」二大部分。大腦如何概括「類屬」、如何劃分「種差」？便成了命名理據形成的關鍵。對於「香瓜子」生成機制，個人做出以下推測：首先，就「葵花子」、「南瓜子」、「西瓜子」三者而言，同樣是可食用的植物種籽，大腦先依照材質屬性概括成「瓜子」、「花子」

²³ 李海霞（2002）研究漢語動物命名，歸納出命名四項總則：1. 聯繫原則——名稱的音、義同對象某個特徵相聯繫；2. 區別原則——掌握住對象的區別特徵（常訴諸感性認識而非完全取決於客觀屬性）；3. 美的原則——把原物描寫得更美好、高級或神聖；4. 簡潔的原則——意義簡潔（取其特點而不面面俱到）、形式簡潔（音節較少、結構簡單）。「香瓜子」的命名，同樣也依循著上述四項原則。

兩個範疇，其中以「瓜子」較為典型，成為大腦直接提取的對象，因此「瓜子」便成為類屬通稱。其次，大腦又再依「瓜子」的品類來源分類，故又可細分出「南瓜子」、「西瓜子」、「向日葵瓜子」、「葵花子」……等，至此大腦採行的是由下而上的路徑。然則，如前所述，信息在腦中傳輸路徑除「由下而上」外，亦會「由上而下」。就「向日葵瓜子」、「葵花子」二者而言，當信息向下反饋時，便會察覺此二者應當是「花子」而非「瓜子」，為化解此一理據衝突的情況，大腦一方面喚起與「瓜子」相連結的各種記憶——形狀、氣味、顏色……等，使之與舊有的詞語「向日葵」、「葵花」產生連結，因此體現瓜子氣味之「香」，便與向日葵之「向」字產生連結，重新創造出看似非理的詞語——「香瓜子」。

試著藉由以下圖式，推測創造「香瓜子」一詞時，各項信息在大腦網絡中相互連通、彼此制約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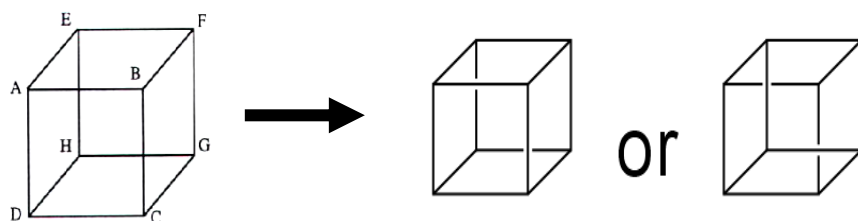
[圖表 10]

在上述推論中，大腦展現「記憶—預測」的能力，在「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反饋過程中，將客觀事物的特徵（瓜子的香味）與對舊有形式的記憶（向日葵）產生連結。「流俗詞源」的生成必須依賴對舊形式的記憶，即如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所言：「類比始終需要把舊形式忘掉；……類比並不從它所替代的符號實質材料裡提取什麼。相反，流俗詞源卻只是對舊形式的一種解釋；對舊形式的記憶，那怕是模糊的記憶，正是它遭受變形的出發點」。（頁 245）

2. 隨機漲落——流俗詞源的多樣性

所謂「漲落」是指由於外部、內部因素而導致系統狀態偏離的隨機現象。漲落是實現自組織的關鍵因素，當複雜系統處在遠離平衡的狀態之下，任何輕微的擾動都有可能對系統最終演變的結果產生劇烈的影響，此種對初始條件的設定表現出高度敏感依賴性的現象，即是所謂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觀察流俗詞源生成的過程，我們也可以體察到「蝴蝶效應」的存在：在字義與字組義呈現非線性關係的條件下，只要詮釋者的視角、立場有著的細微偏移，便可能對內部形式的理解造成極大的誤差。正因如此，不僅同一個詞語被賦予多個流俗詞源，且不同流俗詞源之間具有極大的差異性。

相較於交際過程中所使用的表層規約義，詞語的內部形式具有「潛隱性」特徵，通常它只顯露出冰山之一角，大部分潛藏於意識平面之下、隱匿不見，久而久之，就慢慢地被人們淡忘了。群眾追溯詞語理據，就如同觀賞一幅時代久遠的斑駁畫作，在久經歲月洗刷之後，畫作不僅原有的鮮豔色澤已逐漸黯淡、模糊，就連以往清晰線條也有可能扭曲變形、混沌難分，當後人有機會再重新審視時，也只能以自身既有的經驗與記憶為基礎，對殘存的模糊影像加以重構。然而，隨著觀賞者的視角、焦點……等細微差異，不僅各人對同一畫面有不同的構擬，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可能有不同的體認。這種畫面隨機改變的認知體驗，就如同觀看「內克爾立方體」(Necker cube)一般(如下圖所示)，只要個人視點的稍有偏移，大腦便自動地建構出兩種可能的形狀：



[圖表 11]

觀察各家對於流俗詞源的考證結果，可以發現不少詞語（如：「東西」、「戴綠帽」、「王八」、「吃醋」……等）同時存在著好幾個流俗詞源，²⁴且不同詞源之間的差距極大，有時難以遽然斷定孰是孰非。以下以「白馬寺」之命名理據為例，說明流俗詞源的生成具有隨詮釋者主觀意念改易而隨機漲落的特性。

洛陽「白馬寺」創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 68 年），是佛教傳入中國後所興建的第一所寺院。該寺為何以「白馬」為名呢？令人感到困惑。根據王士元（2000：299）的假設：「白馬」二字並非指稱客觀世界中實際存在的馬，而是對梵語“蓮花”（padma）一詞的音譯。然而，歷來文獻卻記載著許多關於白馬寺得名的傳說，據徐時儀（2002）的歸納，有以下三種不同的說法：

1. 白馬負經東來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于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欃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

2. 白馬繞塔悲鳴

梁慧皎《高僧傳》卷一〈攝摩騰傳〉：「相傳雲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啟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3. 佛祖所乘白馬

據《佛本行集經》、《方廣大莊嚴經》、《普曜經》、《修行本起經》等佛經記載，佛陀出生時有白馬為伴，後來決定離宮出家時又是騎乘白馬，因此「白馬」成為佛教的吉祥象徵物，因而以之作為寺名。

上述三種說法均是將「白馬」理解成「白色的馬」，與初始詞源——蓮花（padma）不符。然而，如何將「白馬」與客觀現實相聯繫，三種說法卻是各自

²⁴ 這些詞語所具備的多個流俗詞源為何？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贅言，請自行參閱王艾錄、司富珍（2002：176-180）的論述。

有別，隨著詮釋者個人主觀意念的偏差而有所不同，呈現出隨機性、不確定性。再者，不同的說法之間呈現出彼此競爭的關係，唯有能夠迎合群眾心理認知者才能得到傳播的機會。今日看來，在上述三種說法之中，以第一種說法最為社會大眾所接納，因而得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在《漢語大詞典》中所徵引者即是此說。²⁵

3. 吸子——異源詞語的共同理據

詞語內部形式有如耗散結構，隨著時空推移而趨向模糊、湮滅，後人根據對殘存線索的記憶，以己身熟悉的概念重構詞語理據，因而產生同一詞語卻有產生多種流俗詞源的分歧現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流俗詞源的形成看似隨機、無序，但卻也發現其中含藏著某種有序、穩定的狀態。我們可以想像：一座丘陵環繞的山谷，圓滑的石頭自山頂滾落，雖然各個石頭滾落的起點、速度、軌跡均有所不同，但最終都會穩定地停在谷底，混沌（chaos）理論將此種在相空間（phase space）²⁶裡能對系統產生吸力的區域稱之為「吸子」（attractor）。

觀察流俗詞源生成、變化過程，我們也可以發現與「吸子」相近似的現象，具體展現為：某些情狀不同、功能有別的事物，卻被重新賦予了共同的理據，例如：人們命名時有多種不同的選擇，但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以「羅漢」、「觀音」……等熟悉的形象來表徵事物命名理據，這也側面反映出「觀音」、「羅漢」的形象在心理認知或社會文化上具有凸顯的地位。以下參考劉瑞明（2003）的分析，舉出現代漢語中以「羅漢」為造詞理據的詞組，並解釋人們如何百慮一致、殊途同歸地以「羅漢」為命名的理據：

●疊羅漢

《現代漢語辭典》：「疊羅漢：人上架人重疊成各種形式是體操雜技表演項

²⁵ 《漢語大詞典》「寺」字條：「相傳漢明帝時，天竺僧攝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白馬馱經至洛，舍於鴻臚寺，後建白馬寺，遂以寺為佛教廟宇之名」。（第2冊 1249頁）

²⁶ 簡單言之，「相空間」是科學家用以描述動態系統行為變化的圖形。John Briggs & F. David Peat 《渾沌魔鏡》：「就機械系統而言，通常用位置和速度來描繪相空間；在生態系統中，相空間可能被描繪成不同物種的族群大小。把系統的這些變數在相空間中的運動繪成圖形，便可透露出其他方法找不到的真象」。（47-48頁）

目之一」。「疊羅漢」應為「疊擦漢」之諧音，「疊擦」兩字同義複說，「漢」則指身體。

●羅漢床

《濟南方言詞典》：「羅漢床：棕板上再鋪上一層藤席的床」。「羅漢」應為「落汗」之諧音，取其消汗、止漢之功能。

●羅漢果

《柳州方言詞典》：「羅漢果，一種藥用乾果，植株是多年生藤本植物。葉卵形或長卵形，花淡黃色，果實近圓球形，烘乾後入中藥，有清熱、止咳等功效」。「羅漢」應為「落嘆」之諧音，理據來自該物具有「清熱」的功能。

●羅漢衫

《漢語方言大詞典》輯姜亮夫《昭通方言疏證·釋衣服》：「單衫曰羅漢衫」。「漢」即「汗」字之諧音，因衣服能收羅、吸納身體所流出之汗，故名之「羅漢衫」。

●羅漢巾

《萍鄉方言詞典》：「羅漢巾：老式的洗臉手巾，用土布做成」。「羅漢」應為「接汗」，「接」為搓揉之義，取其用以「擦汗」的功能。

●羅漢菜

《漢語大詞典》：「羅漢菜：雜合各種蔬果烹製的一種什錦素菜」。「羅漢」當為「羅罕」之諧音，什錦素菜中包含了許多罕見的食材。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以往不同學科之間畛域分明的境況將逐漸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跨學科的相互整合。語言是開放性、複雜性的系統，自組織理論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為語言研究灌注新的養分；儘管自

組織理論涉及到許多深奧的數理計算，著實讓人文學者難以確切掌握其中的細節，但這並無礙於該理論對人文學科上的啟發。在上文討論中，筆者藉由自組織理論的觀點，從不同的面向思考流俗詞源的生成與演化，並試著挖掘出以往被我們所忽略的問題。至於這些問題的答案為何？有些還未能獲得完滿地解決，只能留待日後再繼續深入探究。

四、流俗詞源的正面價值

如果站在古籍訓解的角度看，「流俗詞源」乃是詮釋者主觀比附所造成的荒謬錯誤，因其徹底悖離了典籍的原意，應該予以汰除。然而，如果站在語言交際的角度看，則「流俗詞源」可視為對模糊理據的重新創造，是語言符號為適應現實交際環境所做的調整。經過視角轉換之後，「流俗詞源」便浮現出新的研究價值，它不再是必須被汰除的荒唐謬誤，反倒成為有意義的創新，具有正面的價值。

個人以為：「流俗詞源」提供窺探語言系統運作的一扇窗口，有助於洞察詞語內部形式的生成機制及演化過程。研究「流俗詞源」所引發的相關問題，可以對以下幾個學科領域產生直接的助益：就詞彙學而言，有助於釐清詞形、詞義的歷時演化過程；就對外漢語教學而言，有助於幫助學生避免母語的干擾，迅速有效地記憶漢語詞彙；就廣告文宣的創作而言，有助於利用形象化理據挑動購買者的慾望。分別簡要闡釋如下：

1. 有助於釐清詞形、詞義的歷時演化過程

詞義歷時演化是訓詁學的核心課題，探索詞義的演化，除了必須回答詞義是經由何種途徑、方式產生變化之外，更要追究詞義為什麼會循著這些管道、模式發生變異？換言之，目光焦點除了擺在如何以各種分類方式來描述詞義演化的結果外，更要考慮在表層現象之下所潛藏的內在演化機制。如前所述，「流俗詞源」是在語素義與詞義脫節、內部形式與詞義斷裂的情況之下，詮釋者透過同化、類比的方式所進行的理據溯源，為何語素義、內部形式無法直接與詞義產生對應呢？除了語音訛變、文字通假等詞形外部因素的干擾外，詞義的歷時滋衍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以觀察流俗詞源的現象，不僅有助於理解詞形的變異，更能發

掘詞義在使用過程中，如何通過隱喻、轉喻的運作而偏離原本的意義，進而釐清詞義的演化機制。

2. 促進對外漢語教學與跨文化交際

「理解是唯一的方式，我從來記不得我不瞭解的東西」（轉引自洪蘭《記憶的秘密·序》），讓學生能「知其所以然」無疑是幫助記憶的最佳策略。外籍學生學習漢語詞彙若不知其所以然，很容易受到母語干擾而造成的負遷徙，以自身的概念結構誤解漢語複合詞的內部形式，從而產生可笑的偏誤現象。例如：英語的「雞」（hen）與「雞蛋」（egg）都是單純詞，漢語的「雞蛋」卻是複合詞，外籍學生不識漢語「雞蛋」的內部形式而產生錯誤的類推，認為「蛋」既是「雞」下的，那麼「雞」就是「雞蛋的媽媽」，於是向雞販說：「我要買雞蛋的媽媽」。（轉引自王艾錄、司富珍，2002：219）透過流俗詞源理解詞語理據的湮滅及其重構機制，將有助於協助外籍生更有效率地學習漢語詞彙，避免對複合詞做出錯誤的解釋。

除了詞彙教學之外，漢字更是外籍生學習華語的主要難點。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曾仿效「流俗字源」的改造方式，利用記象之法幫助外籍教士記憶漢字，在《西國記法·立象篇》（1595）云：

但今之字，由大篆而小篆，小篆而隸，隸而楷，且雜以俗書，去古愈遠，原形遞變，視昔日自然之文，反以為怪。而時俗所尚，在古所謂謬訛無取者，咸安用無疑。故茲法取象，一以時尚習見之字為本，特略及古書耳。凡自實有其象者，則象以時有之物。但字之實有其物者甚少，無實物者，可借象、可作象，亦以虛象記實字，蓋用象迺助記，使易而不忘。……如“焉”字、“猶”字皆鳥獸之名，今人多不識其形狀，若記“焉”以一馬正面向外而立，記“猶”以虜酋牽犬，其餘形體之物未曾見者，諸如是推之。

此種方法似與王安石（1021-1086）《字說》如出一轍，以圖像方式結合使用者的心理，賦予漢字新的理據，雖詮釋之字義荒誕不經、悖離漢字之本義，但此法對於輔助外籍人士學習書寫漢字、辨識漢字卻有著極大的便利性。

3. 增強廣告文宣之形象性

「內部形式」一端聯繫現實的客觀世界，一端聯繫著心中的概念範疇，既體現範疇化的結果，同時也是語言符號生成的動因。音意兼譯的外來詞經常涉及詞語理據的重造，尤其對於外來商品名稱的翻譯最為明顯，翻譯者希望透過形象化的理據將商品名稱與現實世界緊密連結，藉以刺激感官、引發情感，進而挑動購買的慾望。例如：威而剛(Viagra)：「服用之後既威猛又剛強」；幫寶適(Pampers)：「使用後幫助寶寶變得很舒適」；可口可樂(Coca-Cola)：「喝了既可口又快樂」；雪碧(Sprite)：「像雪水一樣清涼、碧透」……等均是改造原詞理據而成。

此外，海報、徽章、標誌的設計也涉及詞語理據的重新改造，從下列兩個圖案可見一斑。



[圖表 12]



[圖表 13]

左上圖為 2009 年台北聽障奧運的徽章，設計者以「北」字為原型加以改造，在整體設計上，利用簡潔柔順的線條勾勒出人耳的外廓，再搭配書法筆觸巧妙地營構出「人・聽・奔跑」三種要素相互融合之視覺意象，藉以體現奧運主題——「台北聽障奧運會」。²⁷右上圖則是高雄師大進修部的部徽，圖案主體以書法的筆觸繪出中文的「之」為造型，營造出「向前躍起及向上飛揚的人」之視覺意象，意指：進修部的宗旨在於協助個人求取新知、增進學能，進而使學習者獲得向前邁進、向上提升的多方效益，領受到欣喜雀躍的愉悅情緒。凡此，均是為了達成

²⁷ 此一圖例，承蒙匿名審查委員告知，謹致謝忱。

有效傳播信息所做的考量，圖徽、標誌的設計者特意捨棄了符號本有的理據，在舊有形式的基礎上重新賦予新的理據，藉以營造出形象化、趣味化的效果。

五、結語

傳統訓詁學注重通讀經典之「實用」效益，對於零星散見的「流俗詞源」現象多以「世俗語訛」、「音隨義變」含糊帶過；而當代學者多站在現代語源學（etymology）的立場思考，²⁸強調以「科學」方法重構詞語的原始形式，將「流俗詞源」視為與「專家語源」並舉對立的反義概念，認為「流俗詞源」是欠缺客觀分析、科學驗證所造成的謬誤，應該予以更正、汰除。

然則，老子有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第11章）人們看待事物不僅應正視「有」之為利，更不能輕忽「無」之為用。若能轉換視角、反向思考，便會赫然驚覺在「流俗詞源」的錯誤表象之下，隱含著許多深具意義的課題，值得研究者深入發掘、仔細探究，誠如張紹麒（2000：4）所言：「（流俗詞源）是語言變異研究的重要材料，是漢語詞彙研究，尤其是語詞符號結構及其變異研究的重要方面。從這種意義上講，流俗詞源應該被看作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課題。它牽動著普通語言學、文化語言學、詞彙學、符號學等許多領域的許多問題，對它尚需認真地、深入地進行探討和研究」。

訓詁學應該如何與時俱進呢？訓詁學是否應只滿足於探究古文獻詞義問題呢？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本文另闢蹊徑，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思考，借用自組織理論分析「流俗詞源」生成、演化的相關問題，試著回答：是什麼原因導致古人誤釋詞源？古人如何建構出流俗詞源？建構流俗詞源所涉及的心理機制為

²⁸ 表面上看來，「流俗詞源」與「語源學」似乎同樣是以構擬詞源為目標，但仔細辨析，不難發覺兩者無論在預設前提、擬構方法、為學目的上均是截然不同，如同「現代化學」與「煉金術」的差異一般，是不可共量的兩個概念範疇。「流俗詞源」以音義之間具有必然的理據為前提，憑藉著詮釋者個人主觀的聯想，以自身熟悉的語詞改換陌生的字詞，試圖解釋事物得名的道理；「語源學」則以音義之間之任意性為預設前提，運用歷史比較法，客觀的對比不同親屬語言的基本詞彙，擬構出詞語的原始形式，進而解釋語音、詞義的歷史演變過程及與其他語言的親緣關係。

何？流俗詞源是否具有正面價值？……等問題，希望能夠藉此拋磚引玉，共同為訓詁學之開展摸索出可行的新路徑。

引用文獻

- 王士元：〈白馬非馬：一個俗詞源的考察〉，《語言的探索》：298-304，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0年。
- 王艾錄、司富珍：《漢語的詞語理據》，北京：商務，2001年。《語言理據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
- 王艾錄：《漢語理據辭典》，北京：華齡，2006年。
- 王 軍：《漢語詞義系統研究》，濟南：山東人民，2005年。
- 王 寅：《認知語言學探索》，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
- 王銘玉：〈對皮爾斯符號思想的語言學闡釋〉，《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1998年，6：1-7。
- 瓦爾（Cornelis De Wall）：《皮爾士》，北京：中華，2003年。
- 史諾（C.P.Snow）林志成等譯：《兩種文化》，1959年，台北：貓頭鷹，2000年。
- 朱 彥：《漢語複合詞語義構詞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學，2004年。
- 伍鐵平：〈論詞義、詞的客觀所指和構詞理據〉，《現代外語》，1994年，1：1-7。
- 利瑪竇（Matteo Ricci）著、朱維錚編：〈西國記法〉，《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2001年。
- 何自然：《認知語用學——言語交際的認知研究》，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6年。
- 李巧蘭：〈皮爾斯與索緒爾符號觀比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1：115-120。
- 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呂叔湘：《語文常談》，台北：書林，1993年。
- 保羅·西利亞斯（Paul Cilliers）曾國屏譯：《複雜性和後現代主義——理解複雜系統》，上海：上海世紀，2006年。
- 金基石：〈流俗詞源與語言文化心理〉，《延邊大學學報》，1994年，2：82-86。
- 苗東升：《系統科學精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8年。〈非線性思維初探〉，《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5：94-102。
- 俞 敏：〈古漢語裡的俚俗語源〉，《燕京學報》，1949年，36：47-70。

- 俞理明：〈“香瓜子”的來源和形成機理〉，《語言科學》，2003年，4：88-91。
- 哈肯（H.Haken）郭治安等譯：《大腦工作原理——腦活動、行為和認知的協同學研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2000年。
- 曾國屏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上海：上海世紀，2005年。
- 索緒爾（F. de Saussure）高明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台北：弘文館，1985年。
- 徐時儀：〈白馬寺寺名探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4：23-27。
- 徐通鏞：《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長春：東北師大，1997年。
- 《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05年。
- 張良林：〈索緒爾與皮爾士符號學觀差異分析〉，《長春師範學院學報》，2004年，4：115-118。〈評語言符號任意說與象似說之爭〉，《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6年，5：112-115。
- 張志毅、張慶雲：〈詞的理據〉，《詞和詞典》：22-39，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4年。
- 張永言：〈關於詞的“內部形式”〉，1981年，《語文學論集》：136-147，北京：語文，1992年。
- 張青棋：〈略論自組織理論中的有序與無序問題〉，《安徽大學學報》，1995年，4：102-106。
- 張 軍：〈漢語成語中的流俗詞源現象——兼談對流俗詞源的誤解〉，《內蒙古大學學報》，2000年，增刊：81-83。
- 張紹杰：《語言符號任意性研究——索緒爾語言哲學思想探索》，上海：上海外語教育，2004年。
- 張紹麒：《漢語流俗詞源研究》，北京：語文，2000年。
- 張維鼎：〈語言文化編碼中的理據與任意〉，《外語教學》，2003年，6：38-43。
- 張鳳、高航：〈語言符號的任意性、象似性與理據——索緒爾的任意性觀點和皮爾斯的象似性觀點解讀〉，《山東外語教學》，2005年，5：16-21。
- 陳建生、楊玉娟：〈詞義的範疇化與非範疇化〉，《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06年，3：143-148。

-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1986年。
- 郭鴻：〈索緒爾語言符號與皮爾斯符號學兩大理論系統要點——兼論對語言符號任意性的置疑和對索緒爾的挑戰〉，《外語研究》，2004年，4：1-5。
- 曾昭聰：〈語言的任意性和詞語的理據揭示〉，《天津師大學報》，1998年，5：57-61。
- 〈漢語詞源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暨南學報》，2003年，4：99-107。
- 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沈力譯：《混沌中的秩序》，台北：結構群，1990年。
- 楊清：〈俗詞源現象淺議〉，《外語學刊》，1994年，4：50-54。
- 黎良軍：《漢語詞彙語義學論稿》，桂林：廣西師大，1995年。
- 劉正光：〈語言非範疇化的工作機制〉，《外語研究》，2005年，1：9-15。
- 劉瑞明：〈含假“羅漢”、“觀音”的趣難系列詞〉，《語言科學》，2003年，4：81-84。
- 劉興均：〈試論《釋名》中的流俗詞源〉，《西南民族學報》，1998年，7：59-64。
- 劉衛平：〈創造性思維活動的自組織過程〉，《系統辯證學報》，2000年，2：10-13，18。
- 劉寶俊：〈比較詞源學研究四例〉，《民族語文》，1999年，2：37-43。
- 錢鍾書：《管錐編》，台北：書林，1990年。
- 譚汝為：〈因聲起意與流俗詞源〉，《語文建設》，1998年，1：42-44。〈內部形式、構詞理據和流俗詞源〉，《浙江樹人大學學報》，2003年，54-57。
- 霍金斯、布萊克斯利（Hawkins & Blakeslee）洪蘭譯：《創智慧——理解人腦運作，打造智慧機器》，台北：遠流，2006年。
- 蘿普（Rebecca Rupp）洪蘭譯：《記憶的秘密》，台北：貓頭鷹，2004年。
- John Briggs & F. David Peat 王彥文譯：《渾沌魔鏡》，台北：牛頓，1993年。

Exploring the Annihilation and Reconstruct of words' inner forms from folk etymology

Wang, Sung-mu^{*}

[Abstract]

Before linguists traced back to the etymology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e general public had created and associated unknown words to familiar, assimilated, analogical ones rationally. This kind of etymology certainly is unreliable after precisely proving. Förstemann, a Germany linguist, entitled this phenomena "Volksetymologie" (Folk etymolog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folk etymology, exploring the inner factors within the language symbols with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investigating the outer ones, says inner cognition, personal experiences, cultural influence, within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 Along with thos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picture the dynamic course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folk etymology.

Keyword: folk etymology, motivation, inner form, dissipative structure, lexical evolvement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